

前言：為什麼應該重視
公共健康倫理學的研究？
Introduction: Why Should We
Prioritize Research in Public
Health Ethics?

范瑞平 徐漢輝

Ruiping Fan and Xu Hanhui

Public health is widely recognised as a public or collective good with non-rivalrous and non-exclusive traits. Nonetheless, the advancement of public health often demands resource allocation necessitating adherence to ethical standards in government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The diverse ethical principl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lead to diverse conceptualis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s of effective policies to enhance public well-being. Hence, comparative cross-cultural analyses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pertinent matters. This collection of thematic essays and commentaries within

范瑞平，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哲學講座教授，九龍，香港。

Ruiping Fan, Chair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Public & International Affair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Hong Kong.

徐漢輝，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青年研究員，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Xu Hanhu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ics for Human Fu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外醫學哲學》XXII:2 (2024年)：頁 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2 (2024), pp. 1-7.

the journal introduces and investigates key topics in research on public health ethics.

公共健康倫理學 (public health ethics) 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有的學者特別強調它與生命倫理學 (bioethics) 的不同之處。例如，公共健康倫理學的一位主要宣導者，Angus Dawson，曾經指出：公共健康活動包含兩個關鍵特徵。首先，它們旨在保護和促進大群體或大人群的健康（但不包括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個體臨床接觸）；其次，公共健康行動勢必涉及集體活動，例如政府、醫療系統，乃至整個社會（但不包括改善特定個體健康的行動，除非是在針對某個群體的特殊活動背景下）(Verweij & Dawson 2007)。在他看來，這兩個標準共同勾勒了公共健康倫理學的研究輪廓，即旨在保護和促進公眾健康的研究，不同於針對個人的生命倫理學研究。

這一看法顯然極有見地。然而，對於公共健康倫理學與生命倫理學之間的學科關係，我們傾向於贊同本期英文主題論文的作者 Kathryn L MacKay 的觀點：當今生命倫理學涉及廣泛的研究領域，而公共健康倫理學乃是其中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

這是因為，如她指出，生命倫理學致力於探究所有健康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倫理問題。它涉及的不僅僅是傳統的醫學倫理或臨床倫理方面的困境（如安樂死、人工流產等），或者醫患關係的問題（如知情同意、保密等），而且還包括與保健系統、公共衛生和全球健康相關的更廣泛的一系列倫理問題，以及至少一部分環境、動物和生態問題。但隨著生命倫理學研究的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凝聚成了具有自己明確定義和獨特性的子領域，特別是研究倫理、臨床倫理和公共健康倫理。攻讀生命倫理學學位的研究生很可能會修讀關於臨床、研究和公共健康倫理的課程，以及關於生殖倫理、遺傳倫理或新的生命醫療技術倫理等課程（而且這些主題還可能跨越研究、臨床和公共健康等不同領

域)。因此，可以將生命倫理學與公共健康倫理學之間的關係理解為屬學科與種學科之間的關係 (MacKay 2024)。

的確，當關注重點從臨床醫學中的單個患者轉變為整個人群時，這已成為公共健康倫理學的中心特徵，也影響了這一研究對於倫理問題做出適當解答的形式。正如有的學者最近所總結的，公共健康具有四個特徵，為公共健康倫理學提供大部分主題內容：(1) 公共健康是一種公共的或集體的善 (good)，(2) 促進公共健康需要特別關注預防，(3) 促進公共健康往往需要政府行動，以及(4) 促進公共健康涉及一種結果導向 (Faden, Shebaya, and Siegel 2019, 12)。這些特徵使得公共健康倫理學研究成為既重要又有理論發展潛力的一個領域。

本期中 MacKay 的英文主題論文與叢亞麗的中文主題論文都提示，我們應該重視公共健康倫理學的研究。理由涉及許多方面，本前言只想結合這兩篇主題論文及個別評論文章的內容，提示其中的兩個方面，以供讀者參考。

其一是公共健康的“公共性”或“非個人性”特徵及其倫理蘊含，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哲學理論探索和社會實踐研究。

正如 MacKay 指出，在公共衛生領域，諸如衛生設施、食品衛生監測、空氣污染監測、傳染病控制、疾病篩查計劃（包括某些癌症類型）以及應對吸煙或飲酒等風險因素的活動，都旨在降低常見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病率。然而，其目的並非是使某個個體更健康，而是旨在提高整個受檢人群的健康水準。這意味著人群中發病率或受傷害率降低的好處不容易個體化。這就產生了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問題，因為“健康”原本是屬於個體的特性。在公共衛生干預中，我們難以確定哪些個體沒有經歷本來可能發生的疾病，或者誰避免了受傷害。除非資料收集更加細緻，否則我們無法看到資料如何隱藏群體內部和群體之間疾病和受傷害經歷的個體差異。相反，我們只能看到整個社區中某種疾病或某種傷害發生率較低或較高而已。

公共健康促進手段的這種“非競爭性”（non-rivalry）和“非排他性”（non-exclusion）確實很有意思。例如，城裡的清潔空氣有利於每個人，一個人呼吸到了並不影響其他人也能呼吸到。然而，我們也需要認識到，這一特點也是有限度的，因為它往往需要提供資源才能取得，而提供資源總是有代價的。特別是，提高整個人群的健康水準並不意味著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就是合理的。即使要求平等不是追求公共健康的主要關注，但如果為了確保那些原本較為健康和狀況較好的人變得更加健康和安全，卻忽視了改善處於劣勢的少數人群所面臨的疾病或受傷情況，那麼即使總的發病率減低和健康率提升，也很難將這種情況辯解為在道德上是合理的。

劉佳寶的評論指出，MacKay 提議的公共健康倫理學特別著眼於政府可以實施政策加以干預的公共領域。然而，很多公共健康問題絕不僅僅取決於政府行為。如果說倫理學關涉的單位除了政府就是個人，這恰恰陷入了過於狹隘的現代社會想像之中，因為在個體與政府之間還有很多其他的組織或共同體，比如家庭、社區、學校、非政府組織、公益組織、企業等等。因而，如果公共健康倫理學僅僅考慮政府政策的話，必定是有局限的。而且，公共健康倫理研究不應該僅僅使用更多的數學和統計學方法以提升其科學性和普遍性，還需要考慮特定的歷史、文化。

陳成斌的評論以一個具體的公共健康倫理問題——疫苗接種——為例展開套論。雖然他承認 MacKay 所強調的美德在公共健康倫理學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時指出「強調美德」與發展整全的「德性倫理學」有著微妙的區別。他建議借助後果評估和能力進路來補充 MacKay 的理論，論證這些方法能擴展對疫苗接種的倫理後果的理解，並與美德的重要性相契合。在他看來，只有納入多元的倫理框架，才能有效應對疫苗接種的挑戰。

王慶新認為自由至上主義和集體主義是一個光譜上的兩個極端，過分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公共健康顯然會損害集體利益，但

政府過分干預個人的健康和隱私問題則會損害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他強調 MacKay 的論文有一個特別值得商榷的地方，即作者提出運用全民監控來對付家庭暴力，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提議。他認為，儒家的家庭主義可以為公共健康提供一個中道的解決方案，家庭應該成為公共健康的一個重要支柱，但遺憾的是，MacKay 沒有提及儒家倫理。

這將我們引向了公共健康倫理學重要性的第二個方面，即涉及不同文化的倫理問題。顯然，不同的文化對於公共健康的價值及其促進手段和道德標準具有不同的規範，需要進行比較研究。

正如叢亞麗在其主題論文中指出，若能從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倫理視角進行比較研究，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入理解公共健康倫理學的問題。在她看來，社群主義強調普遍的善和公共的利益，認為個人的自由選擇能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個人權利都離不開個人所在的社群。儒家文化的團結互助則側重在人際關係，離開相互依賴和交疊的各種社群，無論是人類的存在還是個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維持很久。“眾志成城”是中國民眾在應對非典、新冠肺炎中常用的詞彙，可以直譯為“大家同心協力就像城牆一樣牢固。”但在她看來，這種倫理在社群內部(intra-group)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因此儒家側重家庭和互助的美德很容易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辯護。但對於社群之間(inter-group)，便可能有困難了。她認為，儒家文化中基於關係的親疏遠近而決策的傳統現在中國社會仍然普遍存在，人們熟悉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便是一個寫照，表現為居住社區之間通行的阻隔，政府不同部門進行決策時的割裂等等。總之，她擔心，儒家側重家庭和互助的美德，可能對在社群之間(inter-group)如何為“守望相助”提供辯護存在困難，因而有必要借助西方“Solidarity”概念中“在陌生人之間建立相互支持的關係”的內涵予以補充。

對此重要問題，潘大為認為，應該綜合兩個方面的考慮來做出回應。一方面，生命倫理學的論域和概念框架並非一成不變。正如儒家生命倫理學的興起所提示的，善於從非西方哲學傳統吸納利用觀念資源，既是一個從事實出發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地化道德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這樣的吸納利用，並不預設特定哲學傳統是不可變的教條。儘管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宗法社會的家族共居共爨模式向“核心家庭”轉變，但對家庭價值的珍視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類似地，儘管“家國同構”的制度基礎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已不存在，但儒家“修齊治平”的政治理念仍然對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發生持續影響。把論域局限於個體或家庭的中國生命倫理學是不充分的；不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哲學傳統做深入挖掘的生命倫理學則可能是缺乏智性的誠意的。

程國斌的回應指出，事實上，在儒家式的自我、家族、國家和天下的連續的同一性構造中，社群作為仲介，不僅向下構成了個人自我理解與認同的背景，也向上構成了個人成為一個“人”並與自然世界相連通的基礎，即這個“以文化之”的人文世界最終會成為“天下”，成為“人和萬物共同的家園”。在他看來，這可以為社群間的“守望相助”在更宏觀的維度上提供有力論證。

相應地，雖然鄧文韜的回應文章乃是針對 MacKay 的論文而發，但他的論證也與這裡的問題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儒家美德倫理學強調禮，禮的功能在於和諧，禮將各種人類利益整合到一個潛在和諧的系統中，個人在這個系統中學習並實踐德行，使得適當的互動成為可能。然而，僅有正義和禮是不夠的，因為缺乏仁愛的人可能盲目地遵循傳統行為，虛偽地實踐禮儀規則。根本上，偉大的仁愛實踐是關愛親人。因此，資源配置應當從最親近的人開始，這是自然的且實際上是必要的。當沒有足夠的食物來拯救我們的親人、鄰居和陌生人時，我們必須優先考慮我們的親人。儒家德性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在德行的審議和實踐中應

該有明確的次序、區分和差異化，正義作為一種制度德行源自於正義作為個人德行。這一教訓提示我們要把個人倫理與政策倫理結合起來考慮，探索一個正當、仁愛、和諧的個人健康和公共健康倫理系統。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麥凱：〈公共健康倫理學：一種藝術的現狀〉，《中外醫學哲學》，2024年，第XXII卷，第2期，頁11–51。Kathryn L. MacKay. 2024. “Public Health Ethics: The State of 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 no. 2 (2024): 9–43.
- 叢亞麗：〈公共健康倫理思考〉，《中外醫學哲學》，2024年，第XXII卷，第2期，頁101–99。Cong Yali. 2024. “Reflections on Public Health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2, no. 2 (2024): 101–20.
- Dawson, Angus, and Marcel Verweij. 2007. *Ethics, Prevention and Public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den, Ruth R., Sirine Shebaya, and Andrew W. Siegel. “Distinctive Challenges of Public Health Eth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Health Ethics*, edited by Anna C. Mastroianni, Jeffrey P. Kahn, and Nancy E. Kass, 12–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